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往事非烟】	文革时我在重庆大学	周孜仁
【拒绝遗忘】	在“情系母校，书赠恩师”师生联谊会上的发言	杜显怡
【乱世述怀】	有所思	茨冈女神
【铁窗生涯】	狱中杂记（下）	马云龙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往事非烟】

文革时我在重庆大学

• 周孜仁 •

1966年，我22岁，即将从著名的重庆大学毕业。夏季来临，校园小路夹竹桃鲜花盛开。我以优秀的专业成绩修满五年，终于在“潜水电机”（我的毕业设计课题）总设计图上签下了我的名字：距离工程师的梦想，于我只有一步之遥。但是我不敢高兴，因为，要最后在“工程师”头衔前取得那年代必要的定语：“红色”，我还有艰难的路要走。共产党的教育方针——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有明确规定：“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学校当局首先要求学生成为政治工具，成为“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所有受教育者概莫能外。学习内容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具体说，就是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的理论表述得最中国化，最直白：“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史”，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直到1976年他病入膏肓，很快龙驭宾天之时，还躺在床上喃喃呐呐、口齿不清地发布“最高指示”道：“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一、主题就一个：阶级斗争和仇恨

年轻人最爱读小说、看电影、听歌曲，而我们的年轻时代，能接触到的所有文艺作品，主题就一个：阶级斗争和仇恨，于是头脑里就只铭刻了一个概念：人与人的关系，不是“革命同志”，就只能是“阶级敌人”，就只能你死我活，就必须“像严冬一样严酷无情”。那时提供给青少年学习的榜样，从雷锋到王杰、从刘英俊到欧阳海，他们成天提心吊胆关注的，总是军营门口磨剪子的小手艺人、公社大田里偷吃蚕豆的饥谨饿夫，走街串巷叫卖糖葫芦的小贩……是不是都在暗中颠覆共产党江山？

为了批量制造与这些敌人斗争的革命者，我们要求像中世纪的信徒那样克己、苦修、禁欲、忠诚、蔑视私人情感、抛却个人自由，绝对服从各级教权组织和忏悔牧师，不需要也不

允许独立的理性思考。你只用到革命领袖的教诲里去寻找生存的理由，依靠“神谕”行事就行了。我们都渴望用神圣的献身来证明自己。

大学毕业的前一年夏天，我和同学们曾被派去大巴山区参加为期半年的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所谓“四清”），发动山民揭发批斗乡下的“走资本主义的走资派”。大巴山区穷得叮当响，我所在的达县申家公社十三大队，日工分值仅一毛三分钱（即一个全劳动力干一天农活所得），吃饱肚子尚大成问题，哪儿去找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作为对农村社会一窍不通的大学生，我只能绞尽脑汁触发自己内心的仇恨并煽动他人的仇恨，钻头觅缝寻找好吃懒做的所谓“贫农”充作积极份子，煽动他们去揭发批斗日子相对好过的“生产队长”，批斗早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地主”、“富农”，闹出许多荒唐却让人落泪的故事。除了在国内需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域外情况一无所知的我们还被告知，世界三分之二阶级兄弟都在受苦受难，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而中国原来的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还有整个东欧阵营，全都“变”了！“右”了！“修”了！成为了美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动派的“帮凶”。整个世界都已堕落，等待中国的“革命十字军”前去拯救。

就这样，我们那一代年轻人，于是满心渴望成为拯救世界的天使，等待在未来血与火的人生历练之中，成为小说、电影里的柯察金（前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主人公）、江姐（革命小说《红岩》的主人公）和林道静（小说《青春之歌》的主人公）那样的英雄，为虚妄而壮丽的事业献身。

这样，我的大学毕业之年，机会终于等来了。正好我整日扑在绘图板上设计我的潜水电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开始连篇累牍刊发的社论、文章，批海瑞、批邓拓、批吴晗、批廖沫沙、批翦伯赞、批《燕山夜话》、批《三家村札记》……满纸弥漫火药味。年轻人眼里，这都是共产党和学界的大老啊！接下来的事情愈发耸人听闻，重量级更高的大人物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也纷纷成了“黑帮”；毛泽东宣布：十七年的教育界是“资产阶级专政”、中宣部是“阎王殿”、文化部是“死人洋人部”、外交部是“三和一少部”、中联部是“三降一灭部”……还有甚么“二月兵变”之类。毛泽东的江山果然岌岌乎殆矣，必得要我们奋起保卫了。大幕蓦然拉开，等待未来的明星演出，那时刻年轻人的兴奋、激动、跃跃欲试，可想而知——虽然发生在北京的故事离开我们重庆还显得有些遥远。

二、向重大校长郑思群开刀

很快，让单纯的重庆天使们大感惊异的事情在自己身边发生了：1966年6月，中央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是毛泽东为了大乱天下亲令点燃的第一把火。重庆市委闻声而动，即刻向重庆大学派来多达数百人的工作组，直接对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开刀。那年月，即便最普通的共产党员，在大学生眼里都是纯洁高尚的圣徒，各级机构的党委、党支部、党小组，都是革命枢机派来训牧愚氓的神圣代表。重庆市委的工作组理所当然受到了大学生们不需要理由的尊崇，可惜很快，大学生却发现工作组的所作所为，咋和每天背诵的训条不一样啊？《毛泽东语录》大家早背得比数学公式、物理定理更加滚瓜烂熟，比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的”。可是，市委工作组偏偏一进校就开宗明义宣布，他们是揪“郑思群黑帮”，摸“郑老虎的屁股”来了。更让人惊讶的，他们整理的郑思群“十大罪状”之一：“里通外国”，具体例证竟然是中苏交恶、苏联专家撤离重庆大学时，郑思群给专家每人送一册校园风景照！虔诚的年轻大学生是容不得教义被人玷污的。漏洞百出的“十大罪状”让我们这帮学生第一次发现，工作组为了政治功利，也会背离事实胡编乱造，倘若年轻人不接受他们的谎言，就会被打为“阶级敌人”、“右派”。

只是，文革既然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操弄，最高神谕一律都通过《人民日报》和中央电台直接向全社会每一个人发布，各级党委派出的工作组都不再能垄断解释权和中介权。这有点像路德（Martin Luther）首倡的新教教义，信徒只要凭借心灵的真诚，便可与上帝直接通话，“因信称义”。大学生们确信真理在握，于是无所畏惧；相反，故步自封的市委工作组坚信1957年置无数知识分子于死地的“反右”杀伐是对付大学生的不二法器。这样，工作组将我和我的朋友们内定了“右派”，梦想运动结束“秋后算账”；而我们，准备好了为捍卫教义的纯正而献身。这现象也正像马克思评说新教革命：“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恢复了信仰的权威。”毛泽东的文革正是要摧毁所有基层官员的权威，取而代之的是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唯一的、最高的权威。

我们坚持对抗还有一个原因：校长郑思群也是老共产党，资格和行政级别比市委书记还高呢。再说，他具体地生活在大学生身边，身材修长，眼窝深陷，很像1960年代年轻人革命教科书、小说《牛虻》主人公阿瑟（Arthur Burton）的忏悔神父蒙泰尼里（Padre Montanelli）那么端庄慈祥，要赢取得年轻人幼稚的尊崇之心绰有余裕。这就出现了第二个问题：和蔼可亲的老共产党校长和处处背弃领袖教义的、蛮不讲理的市委工作组，到底谁是真的革命圣徒？大学生断然选择了前者。工作组恶狠狠地以“右派”帽子相威胁，得到的只有大学生更强烈的反弹和用《毛泽东语录》做武器的嘲弄与奚落。工作组无计可施，干脆直接动手，将郑思群押解到嘉陵江边一处叫松林坡的秘密地点进行地下批斗。

据郑思群夫人、重庆市委党校副校长吴耕书女士事后对我说，郑被关押前夜，夫妇二人曾有一次达旦长谈，她感觉丈夫对于共产党内部的政治恶斗已万念俱灰，决定一死了之。8月3日，郑思群果然在监视室避开管理人员，用藏匿在《毛泽东选集》中的半片刮胡刀，出手迅疾地割断颈动脉：顷刻间血喷如注，将墙壁染得一片鲜红。眼见工作组逼出了人命，重庆市委的头头脑脑迫不及待宣布郑思群“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命令立即火化尸体，清洗死亡现场。

郑思群之死让重大学生对于共产党市委曾经的迷信彻底破灭，仇恨的旋风迅速卷起。他们根本不相信郑思群这个伟大的圣徒、共产党高级干部会自杀，而是遭遇了谋杀。因为事件发生的时间太短暂，仅仅几分钟，而且死亡现场被清洗得如此迅速干净。一个很有刺激性的故事于是开始了。为了追寻阴谋的真相，他们自发地在死亡现场轮流值守。来自不同系班的同学们，在松林坡山风夜露之中，日夜不息地交换观点，燃烧仇恨。对曾经神圣的基层党机构的信仰开始崩塌。我们确认工作组和市委已经背弃了毛泽东的教义，堕落为“修正主义”异教徒，事情至此，我们心中只剩下了对于教义和最高领袖的绝对信仰。基层党委用来训导我们的武器，现在反过来对准了他们自己。

恰恰这个时候，毛泽东宣布全国大专院校的工作组，都是他要打倒的政敌刘少奇背着 he 私下搞的邪行，必须全部撤销。我们理所当然感觉毛泽东再一次解救了自己。我们决定走向街头，向全市人民说明真相，彻底追查谋杀郑思群的幕后真凶。重庆大学几千同学抬着〈致全市大专院校革命师生的公开信〉的大字报走去其他学校串联——先是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接下来是重庆师范专科学校，时间是1966年8月15日，地点是重庆师专广场。几万人——有闹事的学生，也有当局组织前来围攻的工人，还有围观的群众——山城重庆40度的炎炎烈日下，闹腾了整整一天——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体喧嚣，就是著名的重庆“八一五事件”。

需要说明的是，这封公开信后来被称为“重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正是出自我的手笔。记得写信那一夜，我自觉满腔热血沸腾，正在书写历史。我当然不知道，正是这个文稿成了我漫长人生噩梦的起点。

还需要说明的是，后来的事实说明，包括重庆市委在内的各级当权者，对于毛泽东这场突如其来的运动到底要干甚么，事实上一无所知。他们以为这次所谓“大革命”，无非是共产党执政后多次整人运动的再版而已，既然加了“文化”二字，无非是要在文化教育界抓些个倒霉蛋来开刀罢了。郑思群性情孤傲，潜心教育，于官场离群索居，因此不幸被选中了：不管从级别、社会影响力、还是便于向上司交差，用郑思群祭旗都该是既简单又利索的，没想到这一次偏偏撞了南墙。“八一五事件”后第三天，8月18日，毛泽东便身着绿军装，臂箍印有“红卫兵”三字的红袖套，登上天安门检阅“文化革命百万大军”，公开号召全国学生造反。曾被称为“红卫兵节”的场面之狂热、野性、恐怖，让人想起潘多拉魔瓶中呼啦啦奔窜而出的魔鬼。接下来，这些“天兵天将”便开始满世界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冲商家，砸庙宇，抄家，提着铜头皮带暴打老师，把教授学者一批批押解批斗……消息传来，重庆大学的学生们兴奋雀跃，很快也成立了战斗团，正式开始与市委进行集团作战。为了纪念造反举事的日子，他们把自己的组织取名“八一五”战斗团。

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市委当然不能容忍自己的地位受到挑战。他们针锋相对，也立即组织一批年轻人成立一个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保皇派队伍，动员他们控制的所有病态力量对造反派进行反击。他们编造了一个子虚乌有的“八二八惨案”，说是8月28日这一天，重大“八一五”学生围攻江北区一所名不见经传的中学，丧心病狂地将一名女教师头发扯光，裸体游街，用两扇门板将一驼背老师夹在其中整形取乐，还将一名叫季开阳的医生打得“脾破裂”……官方用天方夜谭式的谎言煽动起重庆市全民的仇恨与声讨，让初入政治幼儿园的大学生顿时深陷重围，不知所措。我们孤立无援，数千人只好夤夜出发，高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徒步上北京，找最高神灵直接求助。

如果用赌博的术语说，这一次，造反派的宝确实押对了。这一回，毛泽东确实想要摧毁自己建立起来的官僚体制，试图用一个“天下大乱”来达到另一个由他及其思想绝对主宰的“天下大治”。有北京的支持，“八一五”迅速扩大成了涵盖全市的包括工人、农民、干部和群众的庞大群体，重庆市委罪错已成，节节败退。毛泽东对大学生不断给予神谕，他们于是力大无穷。到1966年底，仅仅几个月工夫，保皇派便彻底垮台，重庆市委的大老们像是被最高当局遗弃了的一袋袋土豆，只能被群众组织提来扔去，乖乖接受戏弄和批斗。造反派得意洋洋地进驻了原来可望不可即的政权机关。那一刻，喜欢精神自慰的大学生，于是非常庄严地想起苏俄“十月革命”，水兵和工人呼啸着占领冬宫。

8月造反之初，重庆曾出现过一首儿歌，叫“保皇有功，麻饼两封，保皇有赏，麻饼二两”，那年月全民生活困难，吃麻饼属于高档享受。穷学生闹革命，日夜折腾，经常饿肚子，而保皇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值夜班却有麻饼作夜宵。这首儿歌至少说明了权力是多好的东西！造反次年伊始，毛泽东正式号召“全国全面夺权”，于是一夜之间，麻饼就该轮到造反派来吃了。

古往今来，无数历史事实都毋庸置疑地证明了，人世间最强猛的腐蚀剂，就是权力。印把子一旦落到造反百姓手里，曾经神圣的、梦想拯救世界的勇士很快就遭遇了诱惑。事实上，已经变得队伍庞大的造反派，早已鱼龙混杂，除了纯洁的天使，还有为数不少、愤懑于社会不公的底层穷汉、被历次运动整肃的政治贱民，甚至饱受羞辱、企图拼死一搏的野心家、冒险家……他们从来没有抱负救赎世界的使命，只是因为仇恨当局的胡作非为而走进了

同一条战壕。现在好了，夺权开始，为了分享更多权力的“麻饼”，怀抱不同目的的造反派们，开始在私底下霍霍磨刀。

这样，原来在“同一条战壕”“浴血奋战”的战友，很快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在重庆是“八一五”和“反到底”；在四川是“八二六”和“红卫兵成都部队”；云南是“八二三”和“炮兵团”；安徽是“好派”和“屁派”；湖南是“湘江风雷”和“高司”；广东是“风派”和“旗派”……大家都懂得只有占领政治制高点才能压倒对方，因此现在他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在尊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姿态上，必须表现得比对方更忠诚，更疯狂，更不要命。这很像历史上发生过教派之战，双方都以维护教义纯正为利剑，去刺穿对方的咽喉。我担任《八一五战报》主编，我要做的，就是用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以及原来政治辅导员那儿学来的词汇，恶狠狠地对方诅咒为“右派翻天”、“阶级报复”、“牛鬼蛇神”、“混账王八蛋”；发誓“敢同恶魔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歇斯底里地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三、武斗开始了

很快，文字的诅咒已根本无以发泄彼此的仇恨了，必须改用武器来发言，改用血与火来证明自己对教义的忠诚，于是武斗开始了。先是冷兵器：石块、弹弓、梭镖、金属棒……我曾亲身参加过一次解救“战友”的战斗，事情发生在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学院。该院“反到底派”将“八一五派”组织“春雷”赶去图书馆楼顶，然后炸断楼梯，燃烧棉被，撒上辣椒面和“六六粉”，企图用剧毒的火烟熏死困在楼顶的同学。市区的“八一五”于是上千人、分乘几十部卡车夤夜赶去解围。我也手持金属棒参加攻打大楼。战地矢石如雨，我腿部被砸，最终带伤冲上了对立派占领的楼头。我至今记得那一刻，仇恨已完全控制了我的大脑，对于有生命的投降者和没有生命的物品：脸盆、水壶……统统挥棒打去、砸烂，方才解恨。事后我在日记上写了一句：“那一刻，我才明白甚么叫做：‘杀红了眼’。”

冷兵器很快过时，热兵器开始登场——重庆是著名的军工生产基地。除了飞机之外，坦克、军舰、榴弹炮、机关枪……全部从兵工厂的仓库里搬出来厮杀——完全是你死我活了。道路已经断绝，重庆被两派切割成了若干割据区。印刷成了问题，我们的报纸最高发行到几万份，现在只能在学校的小作坊印刷一两千份以维持它的存在。而血肉模糊的死尸，则天天在呼啸的喇叭声中一车车拉进校园。一位负责尸体处理的同学，他的绰号成了经历过重庆文革的人几乎都能记起的名词——“尸长”，这个喜欢助人为乐的“活雷锋”在回忆录里这样绝望地写道：每天看到战场上拖下来那么多“血腥的尸体”，“我甚至想过，万一打不过，有朝一日……就用一颗手榴弹与他（指对立派的‘敌人’）抱在一起同归于尽，为死者报仇。像当今伊拉克那些‘人弹’对待美军一样。”

从天使到魔鬼，就只有一步之遥。

四、战争中的同学

下面需要说说战争中我的同学了。

李盛品，机械系一年级学生，从川北山区考来的农村孩子，喜欢梳偏分头，一看便是那种土气又乖巧的好孩子。1967年8月，我在《八一五战报》第三十五期用了一个整版刊登他的故事，还有他的书信和日记摘抄。我称他的日记为“青年英雄的壮丽史诗”。他的信是写给女朋友的情书。那年月青年人耻于谈恋爱，因为那将被指责为“资产阶级情调”，因此该书信发表时我特意把“女”字删去。情书写于武斗初起，还来不及付邮信的作者便死

了。情信对女友说：“阶级敌人随时到在梦想变天，我们怎能睡大觉？……现在的问题是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夭折的问题。毛主席早已下了决心，要把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现在是决战时刻，是关键，我们一定要努力奋斗，不怕牺牲。”他告诉女友，“为了制止武斗，宣传群众，掌握斗争大方向”，他将到一个“比较危险的”地区去。他没有告诉她，他将在身上挂满手榴弹去前线送命。这是重庆大学自制的土手榴弹，质量大成问题：引爆时间有长有短，为了确保手榴弹扔出后准确引爆，他把手榴弹拉掉引信，准备握在手上延迟一段时间再扔，不幸的是，他拉响的这一枚炸弹引爆时间恰恰很短。他粉身碎骨了。在没来得及寄出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若有甚么不幸，希不要把消息告诉家里人，如果我妈知道了我遇不幸，她肯定也不会再活下去了。你若有空，希到我家去玩，以免除家里人的怀疑。他们若问到我，你可编些话来回答，注意不要前言不搭后语，要先想好。你得消息后，要说不难过那是假的，我只希你不要伤心过度就行了，不要影响身体健康，要想开些，我对得起党和毛主席对我的培养，没有辜负他老人家。”读者们都感动不已，一致要求学校派车到连天炮火中把他母亲和女友从大巴山区接来参加追悼会。一老一少两个不幸女人来到学校，当天我就赶去看望了：老母亲一直扑在学生宿舍桌子上痛哭不止，我只能看见一头散乱的苍苍白发，那么耀眼，慑人心魄！

一位后来和我同样远走边疆的同学侯念平，他把他的文革笔记全部赠送给我，他嘱咐我这个报社主编，今后一定要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他也是从枪林弹雨中侥幸活下来的。他说他们在参加攻打最大的常规武器厂时，一次便死去了八个同学，其中一位是已经快要毕业的机械系四年级大哥哥段亚伟。侯告诉我，说段在战斗中被对方抓住，因不愿举手投降而被拖在汽车后面，活活拖死了（后来查证，段被生擒后，宣布“八一五”战士没有投降的习惯，旋即被枪毙）。侯无比动情地对我说，他才是真正的英雄呀！才是真正没有私心杂念的人呀！段亚伟的追悼会我至今记得清楚，站在前排的老父亲和老母亲低头欲绝。俩老人家都是教师，而且只有这样一个儿子，茹苦含辛，好不容易才拉扯大。可以想象，儿子的死让他们何其悲苦！但是发言的母亲在会上没有像来自山区的李盛品母亲那样泣不成声，而更多些知识妇女的理性。母亲的发言是这样说的：“我失去了亲密的战友，心爱的儿子，内心是非常悲痛的。但是我感到骄傲，因为培养子女的目的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

还有一位同学叫董继平，梦想当电子工程师的大一学生。冲锋时钢盔被击落，子弹得以从他的脑颅斜穿而出——他没有死，甚至没有成为植物人，经过相当时间的治疗，他活了下来，会吃饭、会发音，开始是一些简单的元音：“啊”“哦”之类的，后来，同学们去看他，故意在病床前高呼毛万岁，他麻木的脸会微微一抖，接着会伸大拇指；哥儿们故意又说“刘少奇！王光美”，他又换成了小拇指。《八一五战报》发表的专访文章称他为我们身边的“麦贤德式的英雄”。麦贤德是广东小伙子，1960年代青年人的偶像，他在某次海战中创造了子弹射穿脑颅还高呼毛万岁的人间奇迹。后来，董继平可以在同学的搀扶下蹒跚学步。开始还好，同学们还在学校，还能给他喂食，帮助他解便和洗澡，后来毕业分配，人去校空，这位“麦贤德式的英雄”境况就有说不尽的凄凉了。尤其糟糕的是，他竟开始恢复了记忆！分配外地的同学回校看他，这位“英雄”便会傻傻地诉苦说：“家里还有老母亲啊！还等我毕业寄钱啊！”说着还会流泪！开始，学校每月还支付他十来块生活费，后来，干脆把他遣送回乡了事。同学们都在天南地北为自己的命运奔忙，他也就被慢慢忘却了。直到十多年前，我去四川新津县公差，才知道他的母亲早已过世，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他，只能靠乞讨和拣拾垃圾堆的食物为生，最后，不知甚么时候，他终于倒在了岷江支流那片冷冰冰的河滩地上。

必须说一说那位著名的“尸长”了，他叫郑志胜，电机系四年级学生，著名的“活雷锋”。他没有在战火中死去，而是在战后被监禁了13年。他家境极穷，赤着脚从大巴山区来到大学校园，周末假日，总要独自去垃圾堆拣拾玻璃瓶、橘子皮、废旧衣物，洗干净卖去

收购站，买回理发剪给同学们义务理发，剩余的则交给班上做公共活动费。他的“尸长”诨名和与之相关的人生灾难，是从“文化大革命”演化为“武化大革命”开始的。

1967年夏天，重庆的武斗已经被人称做“八月国内革命战争”了，战场上每天都会拖回不少血肉模糊的尸体，一时难以处理。重庆大学本是“八一五派”大本营，全国重点大学，教学经费充裕，这些经费现在除了用来造手榴弹、冲锋枪，还有就是处理死尸。重庆人称“火炉”，夏天常常40度高温，战场上拖回的尸体很快腐烂，需要注射福尔马林药液，需要擦洗干净，再用白布装裹、下葬。起初，学校找到一个外号“王老么”的裹尸匠王银山处理，裹一具收费10元、腐尸20元、穿尸衣10元、上下车搬运10元。当时，一个大学生一月的生活费才12元呀！每天几具、几十具尸体拉来处理，实属一笔巨款！“活雷锋”郑志胜得知公家的钱被如此破费，心疼着呢，于是断然将此事承担起来。他戴上口罩和塑料手套，每天忙碌在堆放尸体的半隐蔽防空洞，从甲醛池中把尸体一具具捞出来，冲水，抹干，再用白布裹好，挖坑掩埋。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记录和腐尸相处的最初感觉：“我这样不信迷信不怕鬼的人，那背沟麻酥酥的。特别是福尔马林一熏，几天都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啊！晚上我落泪了。”他有些后悔：“谁叫我……鬼使神差（参加了运动）。”

这当然是他后来的心理记录，当时，面对连天炮火——我曾亲自去防空洞看他兢兢业业包裹尸体，在尸衣上佩戴毛泽东像章和红卫兵袖套——我和他一样，脑子里除了仇恨，已经完全没有了理智；除了鲜血，已没有泪水。我在报社的编辑会上号召记者们向“尸长”学习。我们把他视作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接下来，我们的记者果然挂上手榴弹去了前线（武斗队枪枝紧缺，只能发给我们一堆自制的土手榴弹）。我将郑同学看作了完人。根本不知道燃烧的仇恨也让他失去理性，参与了杀人。我和他同时被收审期间，我甚至忘记了自己的无辜，更多的是对郑的同情。

五、郑志胜的回忆录

几十年后，我读到郑志胜电邮给我的回忆录，才知道了更多惊心动魄的残酷真相。我必须把其中几段摘抄下来（笔者只对叙述文字稍作了订正）：

育才中学女生梁自巧矮矮的，白白胖胖、齐耳的短发用发夹别到脑后，见了大学生老大哥总是微笑，一对圆圆的酒窝说明她活得很开心。她时常来我们班，领传单去大街上散发。那天抬来一具尸体，我顿时愣了：“这不是前两天还见过的小梁妹儿嘛！”送尸人告诉我，说她是去给前线的大哥哥们送饭“牺牲”的。她父亲梁大高是建设厂工人，自巧是他唯一的女儿……自巧是我输甲醛第一人。她胖，从腹股沟下切开皮肤查找股动脉，发现她皮下脂肪足有一寸厚。我把针头插进去，打开夹胶管的镊子，甲醛溶液没能流进“股动脉”，反而射出来溅进了我的右眼，我眼睛顿时一阵剧痛，赶紧到附近洗澡堂用清水冲。过了许久，虽然眼睛没有灼痛感，但右眼甚么也看不清了。我用一只左眼继续为自巧输“福尔马林”。输完了把她尸体放到水槽中，注入水，加了苯酚。第二天梁大高赶来，我伸手到水槽中抓着她的裤腰带提出液面让他看，他老泪纵横，哭得死去活来，脑袋往水槽上碰。围观者也为之动容，跟着哭……

机校孙世玉，也是女生，身材清瘦，她是“八一五派”失守杨家坪往沙坪坝撤退时，被“反到底”（派）射杀的。孙的尸体没有浸泡，我给她裹了尸，穿了一套机制校武斗队穿的红色运动衫，戴了毛主席像章和红卫兵袖章，把头发洗净后晾干，梳得很工整，用一块木板安放在防空洞里，放了十多天等她亲人来看了才入殓。机校的同学前来掩埋孙世玉时，悄悄告诉我一件事，他们撤退时去卫校（机制校和卫校当时都在袁家岗），将关押的七个俘虏全部枪毙了。

刘文举（重大学生）从战场上抬回来，尸体还没有僵硬。我给他输了甲醛，裹了尸，穿了一套军装，扎了腰带，戴了军帽和红卫兵袖章。父亲是天府煤矿矿工。刘父和刘母、妹妹一道前来接尸。刘父说：“家里很穷，文举生前从来没有照过全家福，现在他走了，一定要照个全家福作纪念。”为了配合他们实现这一要求，我送他们全家一起来到沙坪坝“双巷子照相馆”，我躲在后面，抓着刘文举的腰带，将尸体推立起来，在父母之间保持站姿，妹妹则站在前面掩护。（这也许是世界上最独特、最凄怆的一张“全家福”！）

（仇恨已经将血液燃烧沸腾。后来，郑志胜终于找到重大专业武斗队的后勤部长、采矿系66届学生陈捷。）

我说：“兄弟伙，你不是要我搞死几个俘虏，为‘八一五’死难烈士报仇吗？现在机会来了。请你给我一支手枪，给几颗子弹。”陈捷高兴极了。给了我一支54式手枪，7发子弹。唐朝全带着长安厂17车间的冯治国、石桥铺中学的廖承平（17岁）在饶家院（重庆大学地名）大门口等我。他们都是到重大避难的。我去车队调来一辆敞篷卡车。唐朝全等三人上了车，我坐司机台，把车开到二工人医院。得知下午抬去的李平正、何明贵（均系嘉陵煤矿的青年工人，“反到底派”武斗组织“猛虎团”俘虏，已受伤）仍在急救室昏迷不醒。我和唐朝全等商量，说：“借转西南医院继续抢救为名，把李、何二人在转院途中搞定，以我招手为号开始行动。”我们四人把李、何二人抬上车，汽车在我的指挥下向西南医院开去。车过覃家岗，我向车上招手。唐、冯一人一个，用枪托猛击李、何二人头部。廖承平没有见过这个阵仗，未动手。我怕他们致命的时间不够，叫司机把车开到凤鸣山桥上才调头到西南医院。我下车去急诊室对医生说：“有两个‘猛虎团’的俘虏被群众打得半死，请你们收治。”那医生是“七医大红总”（属于“八一五派”的组织）的。他说：“八一五的伤员都无床位住，‘猛虎团’的让他死了算了。”我当时估计那李、何二人必死无疑，只是想他们死在医院，事后好交代。又过了二十分钟，在我一再要求下，医生拿了电筒和听诊器爬到车上检查，发现两人瞳孔放大，停止呼吸多时。我的“金蝉脱壳”失败了……

就是这样一个人，毕业分配之前，终于和我一道被收审。我是因为那支自以为是的笔，写过太多捍卫正宗教义的文章，而北京偏偏认定我已经离经叛道，新上台的左派当局毫不犹豫地宣布我是“毛主席点名的黑笔杆”、“反动文人”——这几乎是我们整整一代人的悲剧。历史上的教派战争，历来都以同一尊神的名义开战。那尊神远在虚无缥缈的天堂，因此双方完全可以根据各自的需要对教义进行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解释，最后却以实力来决定胜负。我们的尴尬却在于：我们共同尊奉的神偏偏活在人间，成天躺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研究历代帝王的权谋经典，并随时根据他的需要发布不同的、甚至自相矛盾的圣谕，让两派信徒都无所适从。以至文革爆发两年后，1968年7月27日，他干脆派出军人和工人组成的所谓“宣传队”，进驻了所有大学，宣布“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于全身闹浮肿病”，“我再说一遍，如果谁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不听劝告，谁就是国民党，谁就是土匪，就歼灭！”昔日叱咤风云“天兵天将”，于是一夜之间全变成位列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臭老九”。我被放逐边疆了，开始了另外一种人世间的生活；而郑志胜，因为处理过多达二百多具尸体，人们有充分理由怀疑他必须对许多满身弹孔、血肉模糊的蒙难者负责，事实上，他确实参与了虐待，因此被监禁了13年。

后来郑志胜出狱了。我从云南赶去重庆与他重逢，我们故意将会面地点选择在当年殉难的大校园“东方红广场”。文革时期，那儿曾建造了一尊毛泽东巨像，其后，被大学生以“走资派”罪名打倒的校党委当权者重新上台，于是在一夜之间，他们用仇恨的雷管将塑像炸了个粉身碎骨，只留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碑台上那位被炸掉的巨人，曾经想摧毁他的政敌和几千年留下的文化传统（所谓“四旧”），用他的思想取而代之，从而自成万古景仰的“大成至圣先师”，可惜到头来，传统被摧毁了，他的“导师梦”也破产了，除了对金钱

和物质的追求，整个国家都失去了信仰。我们这一代曾经的天使和魔鬼，只是比别人多了些更沉重的记忆。

和郑志胜分别时，我们风华正茂，重逢时却都两鬓飞霜。历史上任何宗教灾难，总是由教主和信徒共同完成的。我们这一代人和中世纪的信徒一样，和我们迷信的神一道，真诚而疯狂地完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这一巨大的悲剧。历经灾难，几十年望中犹记，我和郑重逢时刻，仿佛两世为人。

我问他：“当初，你为甚么要那样铁心保卫校长，激烈反抗市委工作组呀？”囹圄多年，他已变得有些木讷，沉默许久，他答：“大约一笔难写两个‘郑’字吧？我和校长，家门啊！”

这个答案让我很不放心。我早听说，初进校园时，郑志胜赤脚上课，被细心的郑校长发现了，第二天，校长便让秘书给他送来一双鞋，此事让小郑感动了许多。我于是继续追问：“难道没有别的理由吗？”

他认真地看着我，想了老半天，终于又说了一句：“就为了那双鞋呀！”这一次，我信了。我知道那个充满仇恨的岁月，如豆的些许温暖都会在纯洁心灵激起巨澜，甚至进而酿成人生灾难的源头。我真想大哭一场：为自己、为郑志胜，也为曾被欺骗的、活着与死去的整整一代年轻人。

□ 原载《中外学者谈文革》，熊景明、宋永毅、余国良主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

~~~~~

### 【拒绝遗忘】

在“情系母校，书赠恩师”师生联谊会上的发言

• 杜显怡 •

尊敬的鲁校长、敬爱的各位恩师、亲爱的老三届同学们：

今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到母校，拜见恩师。请允许我向老师们致敬，向同学们问好！

我们老三届同学今年最小的64、5岁，最大的已经70多了。为什么在鬓发斑白的时候重回母校，是因为我们带来了一份迟到的答卷，带来了我们的怀念、感激和愧疚。重庆一中老三届回忆录《岁月无声》、《天地留痕》、《人生几何》一套三本书经过近五年的耕耘、磨砺，今天和大家见面了。这套书的成书时间有五年，由五十多位同学近50万字的文章、200多张老照片组成。然而，准确地说，它不是来自于五年，而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老三届学生这一代人用青春、热血和生命写就；它不仅仅出自几十个作者之手，而是1800多名老三届学生，共同完成。

为什么要写回忆录、要有这三本书？我曾经千万次地问自己，同学们也在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去揭开伤疤，为什么要去寻觅历史的足迹？今天我想试着来回答这个问题：

难忘1963年初秋，老三届学生的我们怀揣理想，踏进了重庆一中的校门。1966年初夏，一个通知、一张大字报、一个延期高考的决定，改变了我们的人生。求学之路被阻断，理想的翅膀被打折，老三届的人生和祖国和人民一起，跌进了历史的深渊。

几十年来，那个疯狂年代那些疯狂事，从未走远。文革动乱、阶级斗争、上山下乡、返城下岗、改革开放……。哪一段历程没有我们的足迹。随着时代和社会的进步，我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历史不能遗忘，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老三届的这一生，与祖国和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和中国现代史上最沉痛的一页紧密相连。在第一本书《岁月无声》里，同学们有将近20篇文章是对文革历史的真实再现，是对那段惨痛经历的血泪控诉。

今天我站在这里，心潮翻滚，我要代表一中老三届全体同学，对年轻无知的我们当年在文革动乱中所做的那些疯狂的事、错误的事，向敬爱的老校长甘道铭、刘锡崑和校领导、向当年的恩师们说一声：对不起！向被我们革命造反派打成了反革命的张庆胜同学说一声：对不起！在这里，我们要沉痛悼念无辜死去的老三届同学郑代光、周庆丰、岳小平、冷代华、周继富。要向过去因为派别原因、因为家庭出身等原因受到打压和伤害的同学致歉，说一声对不起！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如果生命可以重来，我们将不会再堕入那样的黑暗，我们将和被侮辱被损害的你们站在一起。诚如杨建成同学的《满江红》写的：“重拟花名思往事，忍看朋辈成新鬼。猛抬头，咽泪问苍天，谁之罪！”

这是迟来的道歉，这是存放在我们心中好多年的痛苦的反思与忏悔。如果今天不把这些话说出来，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借今天这个机会，我要特别向当年初三3班班主任苏远友老师致敬！感谢你在政治高压下挺身而出，爱护学生，匡扶正义。

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正如饱受摧残的张庆胜同学说的：绝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正如刘家治同学所言“反思文革是每一个中国人应该和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

我试着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这套书为什么能够完成。从开始做这件事，我们就一直在想，这套书能不能完成。凭什么让一中老三届同学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始终热情洋溢地支持这套书的问世。按理说，大家都老了，退休了，身体都有毛病了，带孙辈做家务负担不轻，仅有一点微薄的退休工资，为什么一听说要出书，同学们都积极出钱出力？是什么凝聚了调动了我们的共识和热情？

我以为，那就是一中情缘一中梦。

正如王贤珍大姐的文章里写的，报考高中时，她的三个志愿都填写的重庆一中，在录取通知书的信封上，她自己豪气地写下了重庆一中；小学还未毕业的贺庭富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到一中参观，小小的心灵中萌发了理想：一定要考上重庆一中；黄启俊、何邦文等来自农村的同学，为考上了一中多么自豪和骄傲；具有传奇经历、高远理想的高三2班翟代贵学兄，遭受冤屈被关进了异国的监狱，他还用树枝作笔在沙地上解出了三元三次方程。他说，我只想证明，自己无愧于重庆一中学生这个光荣称号。

古人说，文以气为主。我想一中老三届同学，人人心中都憋着一股气吧。这是历经挫折和苦难不屈不挠的奋斗之气；是自强不息慷慨悲歌的浩然之气，正是这股气，让我们的青春不老，让我们能够奋笔疾书，留下历史的真实。

能够做成这件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中情缘，或者说一中基因。老三届的师生情谊，穿越了50年的风雨，几年里，借助互联网、微信群、QQ群，我们搭起了跨越五大洲四大洋的友情网络。出书的过程既是友情的再续，更是友情的升华。于是，在加拿大的赵雅生、刘景明、在美国的袁长平、王康、在法国的刘学伟等同学发来了文章；在新西兰的暴渝平同学打来了捐款；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写文章，捐钱，出主意提建议想办法，大家都把这当成了自己的事儿。诚如张莘如学兄说的，参与写作重庆一中老三届回忆录这件事，是我退休以来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

母校领导和老师，给了我们指导、鼓舞和帮助，张群力老师更是身体力行，为我们排忧解难，让我们十分感动。请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学校感谢老师感谢同学们。

敬爱的老师，您知道么，在漫长的岁月里，在人生的艰难坎坷中，您是我们前行路上的明灯。我们忘不了您慈祥的笑脸，忘不了您的谆谆教诲，忘不了您的慈母之心。您带领我们踏入知识的海洋，您带领我们不断求索、不惧风雨。我们之所以能做成这件事情，就是想到今生今世一定不能辜负您！

之所以能做成这件事情，还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老三届的旗帜、老三届的精神一直在鼓舞着我们，引领着我们，我们的编委会就是一个洋溢着老三届精神的团队。特别感谢编委会的同学们。

感谢你们，我们携手前行的老师和同学，感谢一路上有你、有你们。  
谢谢大家！

2018年6月16日

（作者为重庆一中初67·3班学生。）

~~~~~

【乱世述怀】

有所思

· 茨冈女神 ·

1966年6月，诗人毛泽东以一首著名的七律《有所思》，拉开了十年探索的大幕——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和他的其他诗作一样，大气磅礴，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的情怀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红学家冯其庸也有所思，他写了一首题为《感事》的七绝——

千古文章定知有，乌台今日已无诗。
何妨海角天涯去，看尽惊涛起落时。

冯其庸知道大事不好，劫难将临，以为跑到天涯海角就可避秦，从容看惊涛起落。

想得美！

诗人写下《有所思》两个月后，1966年8月23日下午。由“红五类”组成的红卫兵把抄家抄来的京剧戏装、道具及其他封资修破烂堆在国子监文庙大院烧毁，一时火光冲天。在火堆旁，跪着29个牛鬼蛇神，他们中间有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荀惠生、侯喜瑞等。牛鬼蛇神们已经全然没有了往日的牛逼，他们头上是皮鞭与皮带齐舞，他们身上是棍棒和藤条齐落，一个个头杵地，嗷嗷叫。

头破血流的老舍次日投湖自尽。

萧军写下了七律《国子监》，为后人留下了这一天的惨烈记忆——

烈火堆边喊打声，声声入肉地天惊。
藤条皮带翻空舞，棍棒刀枪闪有风。
俯伏老翁呈瘦脊，恐惶妇女裂褙襟。
英雄猛士多年少，袒露臂章耀眼红。

陶铸也开始有所思，他在大红大紫的当口突然莫名其妙的坠落深渊，那感觉自是不一般。身陷囹圄，被迫与妻子曾志分别的时候，他给妻子留下了这样一首七律——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松树的风格，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田汉有所思，但他的所思不同凡响。1967年7月1日，受尽折磨已经病危的国歌词作者，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先烈热血洒神州，我等后辈有何求？
沿着主席道路走，坚贞何惜抛我头！

正能量。

他还在诗后写了一行注：“党的生日，入党35周年纪念。”

一年后他死在狱中，连骨灰都没给留。

最正能量的有所思还是我们那位写过历史剧《屈原》、《棠棣之花》、《南冠草》、《武则天》、《虎符》、《蔡文姬》、《卓文君》、《高渐离》的著名诗人，他有一阙水调歌头《文革》——

文革高潮到，不断触灵魂。
触及灵魂深处，横扫几家村。
保卫政权巩固，一切污泥浊水，荡涤不留痕。
长剑倚天处，高举劈昆仑。

铲封建，灭资本，读雄文。
大鸣大放，大字报加大辩论。
大破之中大立，破尽千年陈腐，私字去其根。
一唱东方晓，红日照乾坤。

何等豪情，何等气魄。

他词中所说的“横扫几家村”便是指十年探索期间第一拨儿被探索进去的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三个人不知天高地厚，在北京晚报上开了一个专栏叫“三家村札记”，含沙射影被人民发现了，三个人一起拿下。没过多久，人邓拓和吴晗都相继自裁了，就这个廖沫沙脸皮厚，愣活过了探索期。而且这个人也是爱有所思的，他在一次批斗会等待上台的间隙看见难友吴晗臊眉耷眼的垂头叹气，便去给他打气，小声说：咱现在成名角了，当年北京四大名旦一起出场，还没看我们的人多呢。吴晗问那咱们唱的是哪一出啊？廖沫沙说：五斗米折腰啊！

回到囚牢，他在破纸片上写下了挨斗的感觉——

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如今爱折腰。
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秀斗风骚。

这人，没救了！

自打开始探索，潘天寿就不再是著名画家了，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文化特务”、“国民党特别党员”……探索几年，就斗几年，几乎一天也没落下。身体本来也不好，谁能禁得住无休止的斗？1969年的冬天，他已经73岁了，从杭州押送到老家海宁去斗，吃生活后回杭州，路上捡了一个空香烟盒子，在上面写下了他的有所思——

莫嫌笼络窄，心如天地宽。
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

不久就挂了。

不懂啥是“吃生活”？唉，过几年连外婆也不懂了——吃生活就是挨揍！

黄克诚大将的有所思跟别人不一样，角度不同，高度也不同。这位彭德怀反党集团的二号人物在回忆录《黄克诚自述》中说：4月仲春，看见窗外一株观赏桃树上开满了桃花，花红似火，灿若云霞，但不久即为狂风所袭，零落不堪。有感而作词一首——

满树桃花红烂漫，一阵狂飙，吹掉一大半。
落地残红何足羨，且待来年看新瓣。

人间变化千千万，升降起落，犹如急流泛。
天翻地覆大转换，英雄转瞬成坏蛋。

呵呵。

红卫兵原本是探索者，但很快就沦为被探索了。1968年12月22日，最高最新指示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其实在此之前，红卫兵们已经有许多人感到惶惑不安，他们也都有所思。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郭路生——听这名字就知道是红二代，当年他娘把他生在了行军路上。红二代有诸多坏毛病，但是有一个好毛病：不盲从。郭路生自幼爱读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俄罗斯诗人的书，深受影响。1967年，已经被打倒的老诗人何其芳突然遇到上门求教的郭路生，心情可想而知。这时郭路生已经写了很多诗歌，在地下文学沙龙里颇有名气。1968年，他的有所思完成了——

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仍然固执地望着凝露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这首《相信未来》被江青点名批判，说相信未来就是不相信现在。

很快，大批的红卫兵被装上火车运离北京。郭路生就是在列车4点零8分离开北京的火车上，写出了他的另一篇有所思——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候，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阵阵告别的声浪，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在我的脚下，已经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想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呵呵，北京不需要你们探索了，现在开始探索你们。

一位叫邢奇的北京中学生写了一首非常美丽的诗：《虹》，在诗里，她把草原上雨后彩虹的美丽景致与自己的青春梦想融为一体，读来让人不知道究竟是梦境还是现实——

白日追虹触手空，梦乡再遇却成功。
莫怪青春多异梦，青春色彩有如虹。

另外一位北京中学生施小明则在其词作里描绘了自己暗淡的心情——

羊归何处？漫漫牛车路。
茫茫雪原向西去，不知搬家几度。
落日余晖尽收，寒凝大地生愁。
遥望毡包新立，恰似海上孤舟。

有所思而且思的比较成熟的是史保嘉，她是北岛最初的女友。1969年她从内蒙古辗转至河南、甘肃、山西，吃住都在北京知青家里。回到北京后，她写了这首满江红《答友人》——

别来一载，晋中会，又值年残。
喜重读，华章秀藻，韵简毫寒。
无能信笔任沉浮，有劳俯拾责与赞。
看志得意满文横溢，曾何难。

春秋史，付笑谈。血珠字，任千般。
多才莫诧我，无意苦攀。
躬耕未感天伦乐，凡心宁弃儒子冠。
已秋风隔断归时路，是群山。

既有对自己才情的自得，更有对严酷现实的无奈。

当然，史保嘉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最起码的尊严还是有的，因此，她的有所思与身居下层的知青便有很大的不同。

有一位叫陈自强的四川知青，他是国民党军官的儿子。母亲改嫁，由外婆，不对，由姥姥带大，可以想象到他的艰苦。他下乡的时候写过一首诗叫《独白》——

我要在我的秋天里沉默，
人海的风雨又飘下多少红叶？
热泪和冷笑不能使它变成桑田，
做一个渔父钓一柱人格的独白。

做一个渔父钓一柱人格的独白，
像一棵麻木消磨我残剩的岁月。
希望已落尽还怕什么风风雨雨，
我要在我的秋天里沉默。

他的有所思跟郭路生以及史保嘉完全不同。

还有一位杜九森，他爹是国民党高官，在兵败如山倒的1949年，扔下刚刚出生的他和妻子，自己逃到了台湾。他的噩运因此连绵不绝。

1972年，他在农村做知青时写了这样一首《醉酒歌》——

走走走，喝闷酒
胡豆豌豆都没有
只有嘴啃手
来来来，敞开怀
一醉方休胜活埋
土地是棺材
唱唱唱，自晃荡
知哥知妹浪打浪
句句扎心上
哭哭哭，八阵图
不见爹娘不见屋
泪水大扫除
……

他还有一首题名为《乡下》的诗——

破墙破门破窗破得凶
人寒人苦人霉腰带松
想人想物想钱想得疯
打米打油打盐算得空
怨天怨地怨命怨祖宗
倒汤倒水倒饭倒栽葱

十年探索的最后一首诗应该是哪一年哪一首呢？我想，非这一年的这一首莫属——

1976年清明，北京青年悼念周恩来总理时悲愤的吟道：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有所思，故国人民有所思……

□ 来源：微信号《自由的茨冈》

~~~~~

【铁窗生涯】

狱中杂记（下）

• 马云龙 •



(上接 z k 1 8 0 7 c)

## ◇ 知青囚歌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有一天我正在街上漫步，突然被音响商店飘出的一阵歌声钉在路上，那歌声节奏缓慢而忧伤，如泣如诉，这旋律我太熟悉了，又太遥远了，是一首什么歌？

我循着歌声走进了音响商店。才知道，音响中放的是正在畅销的流行歌曲《囚歌·铁窗泪》，歌手是迟志强。

迟志强是一名在1970年代崛起的电影明星，曾经被评为“全国优秀青年演员”，红极一时。但使他更出名的是一则新闻：“著名演员迟志强被捕判刑”——原来，他因为在南京和几个朋友一起聚会跳“贴面舞”，在1983年的“严打”中被捕，随即以“流氓罪”被判处四年监禁。这是当年轰动全国的新闻，全国正在“清除精神污染”，“贴面舞”被视为来自西方腐朽生活方式的“流氓行为”，他被街道上的“小脚侦缉队”举报了。

一年后迟志强被减刑释放出狱。出狱后他东山再起，复出的方式是在歌坛亮相，而所唱的是他在狱中学会的《囚歌》。

吸引我的不是他的故事，而是他所唱的歌。我很奇怪，他1980年代在南京监狱中所学的歌曲，和我1970年代在河南许昌看守所中听到的知青囚歌怎么那样相似？买了一盒录音带，我反复地听这《囚歌》，越听越熟悉，一段已经远逝的记忆随着歌声又飘回来……

1975年春天，看守所里突然新来了一批“知青罪犯”，大约有十来个，都是从郑州铁路中学插队到许昌农村的学生。他们进来后，每个监号中关一个，成了看守所中少见的“集团犯”。我所在的监号中也进来了一个，叫邵建国，当年才二十岁出头。

我在大学毕业后也有过四年上山下乡的经历，虽然和中学生们待遇不同——我们领取每月四十二元五角的“实习工资”，干活不记工分；而他们没有工资，全靠在农村干活记工分，但是这些下乡中学生们却把我们当成他们的同类。

见面后邵建国立即把我称为“哥们”，亲近到无话不说的程度。在狱中无事可干，只有在哨兵巡逻过去后悄悄地聊天（这也是不允许的）。

邵建国告诉我，他们家原来在武汉，父亲是铁路工人。后来父亲调到郑州局来工作，他们家才跟着来到郑州。上山下乡前他在铁路二中读书，后来和同学一起下到许昌县东的许田公社插队。

他还说，这几个同案犯都是他的同学，他们共同的罪名是“破坏上山下乡犯”。

这很不平常。要知道，“破坏上山下乡”这个罪名原来主要是针对那些地方上和军队里不断发生的奸污女知青的现象，罪犯主要是一些管理知青的干部，最有名的是东北和云南几个军垦农场里的团级干部，他们因此被枪毙了。这个罪名设立的初衷是“保护知青”的，是知青们的政治靠山，从来没有指向知青本身。

“如今风向变了。”邵建国说，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的全国大整顿，其中就包括整治下乡知青中的乱象。这个罪名也指向了知青自己。

“知青中的乱象”确实有。那是发生在“上山下乡运动”后期的普遍现象。据邵建国回忆，刚来到农村时，受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指示的鼓舞，他们都积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靠工分吃饭。生产队对这些从城市里来的学生还多有照顾，县里还成立了“知青办公室”，专门负责解决他们的问题，当时他们和当地的关系还是融洽的。

“上山下乡运动”的先声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就响起了。1964年河北省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上推出了两个新型的劳模：侯隽和邢燕子。他们原本都是城里人，但自愿到农村去安家落户，这是知识青年下农村的最早典型。当年成为全国报纸争相报道的新闻。由此引出了一批北京中学生到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老家山西下乡的热潮。但那时都是自愿的，还不是硬性规定。“文革”中的1968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出发布“最新最高指示”的预告，接着播出了毛泽东那段著名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史称“12·11指示”），《人民日报》于次日发表了一篇重要报道《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在编者按中也全文公布了“12·11指示”，这是全国知青大下乡的信号。从此动员几千万知青“上山下乡”的运动正式开始。

但是，这个运动的“蜜月期”很快就过去了。邵建国说，一年下来，到年终结算时，知青们都傻眼了：所分的粮食根本不够填饱肚子，而工分的分红全年只有十几块钱，还不够回郑州一趟的路费。这种情况不是特殊的例子，全国都是如此。所以后来才出现了福建的知青家长李庆霖向毛泽东写信告状，毛泽东给他寄了几百元钱“聊补无米之炊”的故事。邵建国对我说，其实这也不能怨生产队，社员们的待遇也是这样，甚至还不如他们——他们多少还有点上面下发的补助啊，可谁给社员们补助呢？当时的农村就是这样穷，干一天所得工分的分值只有几分钱。这让知青们的热情一落千丈。

决定性的转折是上面下来了政策，开始从知青中“推荐”优秀者去上大学（所谓“工农兵学员”），还分批从知青中招工进厂，而在这个“推荐”过程中权力的作用开始凸显出来，看背景、托关系和走后门等“不正之风”随之大行其道。邵建国说，眼看着同学中那些有门第、有路子、有关系的一个个走了，只剩下他们这些普通工人和市民的孩子留在农村，上学没门，招工无望，看来他们只有在这里“扎根一辈子”了。

这一来，梦碎了，心凉了，队伍就乱了。

知青们就不再下地干活，而是聚在一起下棋打牌聊大天，甚至喝酒消愁——哪有钱吃喝呀？就去偷——到地里偷庄稼和蔬菜，到村里偷鸡打狗；后来干脆去抢——到农村集市上见肉就夺，见酒就拿，见什么东西抢了就走。知青们一来，赶集的农民们四散而逃，就像现在的小贩见了城管一样。

邵建国说，他们每天啸聚一处，专找农村集市的日子去“打秋风”，每次都满载而归。这一伙知青都是同校的同学，为首的姓郑，外号叫“郑大毛”，长得五大三粗，还留着小平头，颇有江湖气，在他们那一带农村名气很大。据说谁家孩子哭闹不止，只要说句“郑大毛来了”，那孩子立马就安静了。

这个郑大毛和我一墙之隔，果然身材魁梧，但白净面孔，并不青面獠牙，经常面带笑容。每到放风时总站在窗口和邵建国打招呼，后来不知怎么了解了我的情况，还隔墙叫我“马哥”，很难想象他横行乡里时的样子。

他们这一伙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崔守信。他个子并不高，但整天戴着手铐和脚镣——不是那种现代化的“牙铐”，而是用铆钉砸死的“土铐”和“土镣”。那脚镣有二十五斤重，一走起来，拖在地上，像坦克隆隆开过——老犯人都知道，这是死囚的装备。

邵建国说，他杀死过一个人，不是当地农民，而是邻村的知青——“文革”中属于敌对的派系，在郑州两派武斗时已经打出仇来，下乡后同为知青，但派性依旧，从不往来。一次同是在集市上抢掠，两人见了面，提起当年的仇恨，互相先是怒骂，继而动手搏击，拳脚之中，崔守信抽出身上带的三棱刮刀，一刀捅去，对手就再没有起来。

看守所里添了这样一群人，气氛和往日有了不同。监规狱纪他们是不大在乎的。经常隔墙互相呼唤，还把头伸出小窗大声说话，有时还唱歌——一人唱几人和。那首《囚歌》就是他们经常唱的。奇怪的是，连平时最严厉的卫兵对这些知青犯人也很少管，有的还站到窗前和他们聊知青生活。后来我听出了门道，士兵中有几个也曾经算是知青，不过他们不是从大城市中下乡的，而是所谓的“返乡知青”。知青见知青，总难免有点亲近感。

记得这首歌的第一句是“铁门呵铁窗呵铁锁链”，最后一句是“何时我能回到你面前”。中间还有很抒情的“雪花飘落在铁窗前……”等句，因时间久远，我记不清了，估计在流传的过程中歌词是不断被改写的，但是那旋律给我印象极深，就是后来迟志强所唱的曲调，这肯定不会错。

我一直不解，这个曲子是谁作的？作于何时何地？又是如何传播的？何以在十几年后被迟志强在远离千里之外的南京监狱中听到并记录下来了？

记得邵建国当时曾给我讲，这是一首狱中老歌，作于何时，作者为何人不详，但他听说民国年间就在监狱犯人间流传。后来由一代代囚犯传唱，一直传到如今。他们是在知青点听坐过监狱的知青唱过，觉得曲调优美，还不难学会，就当成一支抒情歌曲唱起来——当时知青中流行唱文革中禁止的《外国民歌二百首》中的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和《美丽的梭罗河》等。没想到终有一天他们自己会在铁门后、铁窗前和镣铐下唱起这首《囚歌》了……

邵建国这孩子给我留下的印象不错，率真而聪明。记得当时他还借去我的《唐诗三百首》，一首一首地读，读不懂了还让我给他解释；他还很有兴趣地听我给他讲诗词格律……可惜的是这个好学的年轻人赶上“文革”，整个高中阶段没上过一天课，而是在写大字报、示威游行和武斗中毕业的，毕业后又在农村空耗了几年时光，否则他应该是个读书的好材料。

和邵建国他们分手的那一天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那是1975年的初秋，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天刚亮时，看守所里的气氛就不同往日。吃早饭时，全体卫兵突然全部荷枪实弹地冲进大院，岗楼上还架上了机关枪。随着一阵隆隆的响声，崔守信被带出了牢房，而院子当中摆上了一个大铁砧。几个士兵按住他，抡起铁锤砸向他的脚镣，叮当叮当的声音在院子里回响，中间不时夹杂着崔守信的惨叫。不一会儿，镣铐上的铆钉被砸断了，崔守信又被用绳索五花大绑起来。

有经验的老犯人韩拴紧说：今天要杀人了。  
邵建国说：“崔守信今天要上路了。”

他们猜得不错，这时看守和士兵正一间接着一间地开门，把那些知青犯人一个个带到院中去上绳。

这时，我突然听到，知青犯人们开始哼唱《囚歌》，好像是郑大毛先哼起的，接着其他知青也跟着哼起来。他们显然是用歌声在为自己的同伴送行最后的路。看守大喝：“不准出声，谁再出声给谁紧一绳！”歌声才渐渐止息。

这天上午牢房里比平常要安静得多。人们都一声不响地等待着结果。

临近中午的时候，邵建国等人押回来了——但少了一个，崔守信没有回来。

邵建国进了牢房，就一屁股坐在地上，眼中含泪地说：“崔守信执行了。”过了半晌才接着说：“大毛判了九年，我判了四年……”在他们这一伙中他判的算是最轻的。

吃过午饭，看守通知：今天宣判的人马上送劳改场，立即收拾东西上路。

邵建国一边收拾被褥衣物，一边盯着我的眼睛，犹豫再三后悄声说：“这本《唐诗三百首》……”

我说：“你带着吧，没事好好读。”

于是，他就走了，头也没有回。

我算了算，如今他应该也是将近六十岁的人了。不知那本《唐诗三百首》他还留着没有……

#### ◇ 死去活来的日子

那是2000年的秋天，我还在报社上班。门卫突然上楼来找到我，说：“外面有个人，很奇怪。他让我通报他的名字，说如果你还记得，他就上来见你；如果说不记得了，他就走人，不来见你了。”

我问：“来人叫什么名字？”门卫回答：“黄建庄。”

黄一建一庄……我在脑海里急速地搜索着这个似乎陌生但又似乎熟悉的名字。突然，我愣住了：是他？

“快，快，赶快请他上来！”

我赶紧打扫屋子，倒水冲茶，等待着这位不速之客。同时，深藏在心底的遥远记忆像火山一样喷涌出来。

二十多年前，我在许昌县看守所当“阶下囚”时，这位黄建庄也在那里，但他不是囚犯，而是监所的警卫士兵，当时只有二十岁出头，长得很周正的一个小青年。一连几年，我天天都有两小时能看到他扛着枪的身影在铁窗外晃来晃去（哨兵每两小时一轮换，24小时轮一圈）。那时看守所规定，囚犯平时只能席地面壁而坐，想站起来到屋角的尿缸去小便，

都要先喊声“报告”，等哨兵“嗯”一声以示批准之后才准起来。所以，我和他每天都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交流”着，应该算是老朋友了。

但是，能够使这个名字在我的记忆中长存的并不是这些小事，而是因为他和我生命中一段“死去活来”的惊心转折紧密相连……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这给我的命运笼上了浓重的阴云。本来，从1975年1月10日我被捕以来，除了刚进来时审讯过几天以外，其余的将近两年中我似乎已经被遗忘了。每天白天面壁僵坐，夜晚在长明灯的照射下睡眠，很少有人来打扰，日子过得平静而单调，我已经心如止水，习惯这种“生活”了。但是，毛去世的哀乐声打破了这种平静，我的处境开始发生了一些不祥的变化。

先是在一次大“查号”后把我关进了一间与其他“大号”不相连的“小号”（有经验的老犯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接着在10月1日国庆节那天夜里10点多钟，我在睡梦中被叫醒，懵懵懂懂地被带到看守所外一间灯火通明的大房子里。房间的中央放着一排长桌，桌后坐着一排人，大约有七、八个。中间一个头发花白、文质彬彬的戴眼镜者，像是地位最高的官员。在他们对面的墙角下有一个小方凳，我被指定在那里坐下，一盏大聚光灯照得我睁不开眼睛。

戴眼镜者最先发话：“我是许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亓中山，现在宣布：对现行反革命犯马云龙的审判现在正式开庭。”接着，他派人递给我一本厚厚的起诉书，说：“太长了，就不给你念了，你识字，就自己看吧。”

这时，我才彻底地清醒过来，一页页地翻看着起诉书。起诉的“罪状”从“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攻击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领导”和“攻击河南省领导刘建勋”，以及“攻击党的计划生育政策”等等，共85条，全部是我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的言论。有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课的内容，有在政治学习时的发言，也有平时和同事聊天时说的话，甚至还有在农田劳动时说的笑话……我知道，这是我的三位同事用两年的时间精心记录下来的，有时间、地点和在场人，甚至还有说话时我的方位和其他人的位置，相当翔实。

几年后，当我平反出狱后才知道，这个案件来头不小。那三个同事把对我的检举材料通过“通天内线”直接送到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手中，纪批示给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刘则下令由当时河南省委的副秘书长杨锡淼带队，组成庞大的调查组于1974年底进驻长葛，来调查我的问题（“四人帮”倒台后，这位副秘书长作为“三种人”被抓起来了，还判了几年徒刑。1980年代中期，他刑满出狱后回到郑州，专门请我吃了一顿饭，为了当年领队抓捕我的事向我正式道歉，我接受了）。而执行逮捕任务的是许昌地区公安局的正局长朱干（这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干部，在审讯我时语气亲切而平和，但处理起来却毫不客气。1979年初我被“宽大释放”后，为了要求彻底平反曾找到他家，他在家中接待了我，在我走后一星期内下达了彻底平反的文件）。这个案件曾被定为当年河南省“四大反革命案件”之一。

那个晚上，我一边在聚光灯下读着起诉书，一边暗暗地估量着面临的形势：毛泽东去世后的国庆之夜，匆匆地深夜开庭，而主审法官竟然是中级法院的第一把手，这显然是非同寻常之举。外面的形势如何，我在狱中无法判断，但肯定是相当紧张了。而我知道，每到这种时候，都会有一次大“镇压”，以震慑社会。我的命运凶多吉少，而且时间显然已经不多了！

怎么办？虽然在这个不像样的“法庭”上，除了审判者之外，没有辩护律师，没有一个听众，更没有新闻记者（这是“文革”时期的惯例），但总还有速记员，这恐怕是把我的声音留给历史的最后机会，我惟有全力地为自己辩护了。

于是，我开始逐条地陈述和辩护。例如，罪状的第一条是：我说过对毛主席也要“一分为二”。我辩护说，毛主席说过，世间万事万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难道这对他自己就无效？法官说：“毛主席是英明伟大的，没有错误的。”我说：“别的我不说，把林彪指定为接班人，还写入党章，事实已经证明这就是个错误……”

一条接一条，你来我往，审判成了辩论，进展十分缓慢，天快亮了，法官宣告休庭。等他们吃了饭，睡了觉，再继续开庭。可我却无法休息，休庭时还要在监号里紧张地准备下次开庭的辩护词……就这样，整个审判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个多星期，85条罪状才说了一大半……

突然，在10月10日以后，密锣紧鼓的审判停下来了。

没人再来提审我，也没人向我说明为什么。

这一来，我更睡不着了。一连几天，白天吃不下饭，夜晚无法入眠。就像马三立说过的相声，苦苦地等着另一只靴子落下的声音。

大约是在10月15日左右的一个夜晚，我在长明灯下瞪着眼睛，呆呆地望着屋顶。突然窗外响起一个声音：“你怎么还不睡啊？”声音不高，也不严厉，甚至有点柔和。我抬头一看，是哨兵黄建庄站在窗前。

我回答：“睡不着。”

他说：“既然你睡不着，我问你个问题。”

“好啊。你问吧。”

“你是个政治犯，我考考你。中央打倒了四个人，你能猜出来是谁吗？”

我的心狂跳起来，热血涌上脑袋——原来如此！

为了准确，我又问了一遍：“你是说打倒了几个人？四个？”

他又肯定道：“四个。”

我试着回答：“是不是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

他大惊失色，瞪圆了眼睛：“谁告诉你了？”

这一下我心里有数了。说：“不是你刚才告诉我的吗？你说打倒了四个人，就准是这四个；如果你说是五个，我可能就要猜别人了。”

他脸上露出佩服的神色，嘴里啧啧了两声，没有再说话。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他的脚步声向大门外走去。不一会儿，忽然我头顶一声响，两个白白的大馒头从窗外扔进来——原来他是到部队伙房去拿馒头了。

这是入狱以来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第一次吃到狱粮之外的人间饭食。不知道外面的人们是如何庆祝这个盛大节日的（后来听说北京人是狂吃三公一母四只螃蟹），我是有滋有味地嚼着白馒头来迎接这个天大喜讯的。

比白馒头更香甜的是他带来的消息。要知道，在起诉书里我的85条“罪状”中，涉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就有将近七十条。我明白了法庭审判突然中止的原因：我的大部分“罪状”被这场政治风暴一风吹了，而带来这一喜讯的天使是这个可爱的小兵——我将终生记住他的名字：黄建庄！

这个夜晚，我目不交睫，一直处于极度兴奋之中。心中千头万绪，无以表达，终于在天亮前凑成一首小诗《游仙》：

落松满地霜满天，  
苔侵石床一局残。  
忽惊浩歌三山下，  
狂尘怒海换人间。

几天以后，街头的锣鼓鞭炮声和大喇叭里的欢呼声传进牢房的铁窗，证实了黄建庄带来的消息。

我的这种狂喜的状态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有一天，地区公安局的预审科长于某来提审我（从这个细节我注意到，我的案子又从法院转回到公安局了，这是好迹象）。他阴沉着脸说：“听说你最近很兴奋哪。你别高兴得太早了——‘四人帮’是你打倒的？你在1972年就骂江青，那时候毛主席还没说他们是‘四人帮’呢，你难道比毛主席还高明？别忘了，你还有十几条攻击毛主席的言论呢……”

他说得没错，我是高兴得太早了。在“四人帮”倒台以后，是“两个凡是”的天下。我的劫数还没有到头呢。从这以后，我又在看守所里蹲了两年半，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高潮中，我在1979年春天才得以跨出看守所的大门。但是，这后两年的心境和前两年毕竟完全不同了，因为我知道自己死不了啦，而且还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想着想着，有人敲门了。门一开，黄建庄走了进来。

虽然时光过去了二十多年，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他来了。不过他已经不再是个小青年，而是个中年汉子了。他穿的也不再是军装，而是一身西服。他告诉我，我出狱后，他也就复员回家了。现在，他在老家焦作开了个皮革厂，他当总经理，生意还不错。

我问他怎么找到我的。他说，在家看《大河报》，看到报上有张报社颁奖活动的照片，上面有个人像我，一看文字说明，果然是我的名字，就找到报社来了。

我问他为什么到门口不直接进来见我。他腼腆地笑笑说：“不知道你对那段日子是怎么看的，也不知道你恨不恨我，愿意不愿意见我……”

我哈哈大笑起来，告诉他：我不但不恨他，而且终生要感谢他，因为他曾经给我带来“死去活来”的喜讯。我还告诉他，我不仅不恨他，而且对那些曾经逮捕我、关押我、审讯我的人，也没有恨。而对他们每个人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的人性，我都记在心中。甚至对那三个曾经告密举报我的人，我也没有恨，有的只是鄙视和遗憾——遗憾他们之中竟没有一个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稍微表现出一点歉意和忏悔……

接着我们俩又共同回忆起1976年秋天那个不眠之夜来。我告诉他：那两个馒头真好吃，这辈子我再也没吃过那样香甜的馒头了。如今，真想再吃一回啊！

◇ 漫长的黎明

因为夜太深太长了，从第一声鸡鸣到太阳升起也就格外漫长。

我曾经历过一个长达两年多的“五更寒”——从“四人帮”倒台到我获释出狱。我每天都在想尽办法，了解外面的风云变幻，等待着黎明曙光的升起。

设立监牢，除了严格限制人身自由外，大概还有一个目的，是屏蔽信息。

在铁窗下想了解窗外的信息，是件十分困难的事。看守所为囚犯们订了一份报纸，但并不是每天都送进来，而是经过严格的选择。那时的报纸，本来真正的新闻就很少，大都是领导人的活动、会议、文件和“典型经验”之类的官样报道；到了看守所，又经过一次严格的筛选，凡是登载比较重要新闻的，就不给送进来。我计算过，每周大约只能看到一天的报纸。而这张送进来的报纸，还要在各个监号中传阅。一个号看一天，等传到最后一个监号，已经是半个月过去了，而且经过上百人的手，报纸早已成了千疮百孔的碎纸片了。而这些残存的纸片，对我来说则是宝贵的信息来源。我仔细地读每一段文字，努力想象着文字后面的真实。我想，在外面的人，恐怕没有几个人读报像我这样认真的了。

铁窗下的人自有获得外面信息的渠道。首先是听广播，就是街头的大喇叭（监号中没有收音机和小喇叭）。那些年，河南的城市，从郑州到下面的县城，都有有线广播系统，大街小巷都在大喇叭广播的笼罩范围之下，看守所的高墙阻挡不住大喇叭的声浪。尤其是顺风的时候，有些广播声可以越过高墙，飘到铁窗内。

此外，更可靠的来源是不时进入铁门的新犯人。每个新来的人，都会受到老犯人的盘问，除了他的案情外，还有他在外面的见闻，包括社会上流传的小道消息（在信息严格封锁的社会，这一直是人们得到真实信息的重要渠道）。

第三个来源是看守和警卫。虽然他们有严格的纪律，一般不会透露什么消息，但他们也是人，有了重大消息，难免也会有说漏嘴的时候。例如“四人帮”倒台的重大消息，就是警卫黄建庄有意无意透露给我的。

1977年元旦那天，街头的大喇叭转播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头条好像是照例要发的“元旦社论”，我听不清楚，似乎没发现什么新东西。但是，在新闻节目后播出的音乐，让我一下子震惊了——那分明是一曲悠扬的“洪湖水，浪打浪……”这是1960年代初红极一时的歌剧《洪湖赤卫队》的主题曲。“文革”开始后，在“打倒贺龙”的漫天口号声中，这支歌曲早被作为“黑歌”而被禁唱了。因为歌词中有一句“贺龙领导闹革命”，江青说，这个歌剧和这首歌曲是贺龙“反革命野心的大暴露”。现在，这首已经整整被禁了十年的老歌又公开播出了，这不是说明有些重要的变化正在悄悄地发生吗？

当时，我在狱中并不知道，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已经在1975年6月9日（贺龙元帅含冤逝世六周年）举行过了，只知道《洪湖赤卫队》并没有解禁。我把“洪湖水，浪打浪……”的重新唱响，当成逐渐开始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信号了。这一天，我又兴奋起来了，在铁窗下写了一首七律《元旦听歌》：

悠扬一曲洪湖水，勾起十年风雨情。  
鸥枭横行百鸟寂，华光初照万歌腾。  
是非自有真诠在，功过且听历史评。  
莫笑楚囚铁壁下，惊涛骇浪是人生。



虽然我所盼望的根本性转折并没有在那一年发生，但类似的每一个小的变化，都使我的希望和信心增加一分。

例如，1977年中的一天，站岗的哨兵李子奇突然来到我的窗前，他板着面孔问我：“你在看什么书呢？”

我从身边拿起一本书，说：“在看《资本论》。”

他看了一眼，教训我：“这就对了，你在这里就应该好好学习马列著作，改造思想。”

然后，他说：“我考试你一下，看你学习得怎么样。”接着他给我出了道题：“你说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是什么？”

我吃了一惊：这个当兵的还有这个兴趣？真是人不可貌相。平时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这个人说话刻薄，对犯人总像凶神恶煞一样。最可怕的是他似乎有虐待狂的倾向，吃了晚饭没事干，就喜欢到监号窗口逛，找到个理由就拉出个犯人，到院里去“捆一绳”，听到犯人被捆得狼哭鬼嚎，他似乎很享受。所以犯人们一看到他来了，都很紧张。

今天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也有点紧张，怕他是找茬要捆我一绳呢。

于是，我就小心翼翼地回答了他的问题。我一边回答，他拿出个小本子，一边认真地记着。记完了，他合上本子，说：“回答得差不多——但是还不完全，还要好好学。”

我问：“哪里不完全？”

他说：“现在没空和你说。”然后就走了。

这演的是哪一出？我如坠五里雾中。

下一个接班的哨兵是黄建庄，就是那个告诉我“四人帮”倒台喜讯的小战士。我就把这件蹊跷事对他说了，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一听就笑了，说：“别怕，他是拿你当老师了，他正在准备参加高考呢。”然后，他告诉我，因“文革”而停止多年的高考现在恢复了，第一次高考马上就要举行了。

这个消息又让我高兴了半天。恢复高考虽然和我没什么直接关系了，但是，这说明外面确实在悄悄地发生着一些重要的变化，“文革”的痕迹正在一点点地清除，这对我来说都是好消息。

这位李子奇在高考中到底失败了。参加高考后他依然要每天来站岗。在我出狱前，我们还演出了一幕“狱中捉贼”的剧。

1978年底，妻子给我送进来一条新做的裤子，用当时最时髦的高档灰色“的卡”裁剪的，裤线熨得笔直；因为狱中不准使用腰带，在裤腰上加上了宽松紧带，谁看了谁说好。我收到以后，非常高兴，把这看成是一个无声的信号：她大概估计我有希望要出狱了，所以给我准备了出狱那天穿的“礼服”。

我又犯了“高兴得太早”的毛病。新裤子穿上身，半个月后还没有动静。我只得把裤子换下，借放风的机会洗干净，挂在院中的铁丝上（放风时，先上厕所，把号内的尿缸抬去倒掉，然后到院中的水管去打水，这时有几分钟时间可以洗衣服）。

不料，第二天早晨我从窗子往外一看，昨晚才挂在院中的裤子不见了，就向来开门的看守“报案”了。

在警卫森严的看守所大院里居然发生了盗窃案，这引起了高度重视。我被叫到一边，所长和县中队的指导员详细问了情况。我说出了我的判断：我是昨晚最后放风的，裤子挂在院中以后再也没有犯人出过监号；我发现裤子丢了是在今早放风之前，因此不可能是犯人偷的。丢裤子的时间就在昨晚放风后到今天早晨放风前，这段时间里院中只有警卫哨兵……

紧接着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查号”，所有犯人都被赶到院中集合，警卫挨个给犯人搜身，然后又到各号里彻底搜查了一遍。果然没有在犯人中间发现赃物。

犯人回到监号后，外面又响起了紧急集合哨声。我知道，这是在县中队的宿舍中开始搜查了……

过了一会儿，我又被叫出去。看守所长和县中队指导员拿着一条裤子让我认。我一看，就是那条丢失的裤子。指导员的脸色铁青，一句话没说。所长说：“裤子你拿回去，这件事到此为止，你不要跟任何人说了。”

我不说，可有人说。黄建庄上岗后悄悄地跟我说：“真他妈丢人……”

原来，在县中队吹响集合哨以后，有人把这条裤子匆忙地从宿舍的后窗扔到街上去了（那条街叫衙后街）。一个路过的老太太看到部队营房里掉出条裤子，就拣起来送进来了。

我问是谁偷的，他不说话，只说：“你看这几天谁不上岗了吧……”

我注意到，那位考我“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李子奇有一个星期没有值班站岗……

时间进入1978年以后，外面发生重大变化的迹象越来越清晰了。特别是这年的下半年，送进监号里的报纸上出现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文章。我虽然无法了解这场大讨论的全貌，但从能看到的片言只语中，分明感到一场有重大意义的巨变正在临近。

这年春天，和我同号的“在毛主席鼻子上捅了个窟窿”的李伟森出狱了。到秋天，对几个“政治犯”的提审突然多起来。特别是对“最老的政治犯”田忆秋的提审，更是震动了全监所。

我和这个田忆秋从来没住过一个监号，所以对他没有更多的了解。但是我从刚入狱时就听说，他和已经死在狱中的寇学书是“资格最老”、关押时间最长的犯人。说他“资格最老”，不仅是因为他“文革”初期就进来了，还因为他建国初就曾经是解放军的连级干部——这个人的可敬之处，是他一直保持着军人的风度和尊严。衣服尽管破旧，但风纪扣总扣得整整齐齐，举手投足都像是在走队列。他1957年在部队被打成“右派分子”（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军队里也打“右派”了）。而他被送进看守所，还并不只是因为“右派”，他还有一个更离奇、更吓人的罪名：“日本特务。”

一次在院里打蜂窝煤时经过他的监号，我曾经问过他“日本特务”是怎么回事。他说，在部队时，他的连队里有几个日本人，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留下的技术兵种。这些人编入解放军后，和他一起战斗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54年，中央决定把这些日本人全

部遣返，一个不留。他们不愿走，希望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中，但没获得批准。这些“日本战友”回到日本后，还经常给他来信。他1957年戴着“右派”帽子回乡后，这些来自日本的书信还不断。这种“海外关系”在河南农村成了远近风传的奇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那些日本来信就成了“日本特务”的证据，他被送到看守所了。

关在这里十几年，一直没人提审他。到1978年底，他忽然被提审了，回来时满脸笑容。原来提审他的是军人——军队里正在给当年的“右派”改正，就派人找到他的老家，发现他早就被关到看守所了，于是就找到看守所，目的是给他摘掉“右派”的帽子，顺便也了解一下他的“日本特务”是怎么回事。

这年年底，大喇叭里传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消息，随着“四·五运动”获得正式平反，一个“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到来了。在这里住了十几年的田忆秋居然也有望出狱了（他在我出狱后不久也释放了）。

1979年元旦来到了。那天，我写了一首《七律·迎新年》。这首诗记录了我当时的心情：

岁暮炊烟飘狱门，依稀笑语杂刀砧。  
翻天已录千秋史，覆地更开一页新。  
禁果初尝民主味，快风横扫积冤云。  
夜深扳指细细算，平反出监已几人？

这是我在狱中写下的最后一首诗。19天以后，1979年1月19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被传到看守所外那间大房子里（就是1976年10月1日晚法院对我开庭审判的那间）。许昌地区公安局预审科的于科长（就是四年零九天前宣布逮捕我的人）宣布了对我的“免于刑事处分”和“宽大处理，予以释放”的决定。

我仔细看了这纸留下巨大“尾巴”的决定，当即拒绝签字，表示不接受在这个条件下的释放，要求回到监所里去，等待一个不留“尾巴”的彻底平反决定下达之后，再走出看守所的大门。

于科长劝我说，先走吧，有意见出去后再申诉嘛。

于是，我在那份裁决书上签上“不同意、不接受”的意见后就出狱了。果然，在我出狱后半个月，“彻底平反”的决定就下发到县。一场长达四年多的“大戏”这样才落下大幕。

□ 来源：《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王复兴主编，美国南方出版社，2018年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